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敝刊4月號組織了專輯，邀請多位名家賜文，反響可謂相當不俗，可見「五四」即或已過百年，其迷人魅力依然未見減退。不過，這是否同時反映「五四」的未竟事業至今仍未實現？

——編者

探索數位人文的可能性

數位人文將是未來人文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這一點似乎成了學界的共識。但有了數據庫後該怎麼利用？除了透過關鍵詞找材料，減少「動手動腳」之苦外，還能做甚麼？如何設計數位人文研究？哪些學術問題只有在有了數據庫後才能回答？傳統的史學研究方法還需要嗎？總之，數位人文為人文研究開啟了甚麼可能性？

金觀濤和劉青峰夫婦是中文學界數位人文研究的先進，他們在台灣政治大學任教期間對於發展數位人文的貢獻，可謂有目共睹。〈中國現代主權觀念形成的數位人文研究〉（《二十一世紀》2019年4月號）一文是他們與邱偉雲的最新成果，利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

專業數據庫（1830-1930）」，試圖回答中國現代主權觀念甚麼時候確立。

金觀濤等認為主權觀念在中國的確立既不等於共和政體的建立，也不是國家、國民、民族主義（或民族認同）其中一個觀念的出現，而是需要三個要素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國家主權。按照這一邏輯，如要回答中國現代主權觀念何時確立，便需在海量的文獻中挖掘出三要素的相關語料，以確立三者結合成中國現代主權觀念的時間點。三位作者首先從量化角度考察現代意義上的「主權」一詞在甚麼時候開始出現，發現「國人的主權論述真正湧現時間為戊戌變法失敗後的1899年」。但他們並不因此認為1899年中國人就已經確立現代主權觀念，而是查找三要素在甚麼時間、如何結合成國家主權。他們進一步發現，1898年前，「主權」就與「中國」開始共現，而1898年後，「主權」與「國家」、「國民」兩個觀念開始共現。藉此，他們認為主權觀是在中外交涉的過程裏才進入中文世界的，而國人對國體的認知改變後，「國家」與「國民」才開始穩定地共現。最後，三位作者認為，1905年朝

野形成了立憲共識後，三要素才穩定地結合在一起，因此1905年才是中國現代主權觀念確立的時間。

無論讀者是否被說服，文章無疑是利用數據庫進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嘗試。它啟示我們：一、數位人文不只是輸入關鍵詞以得出頻次而已，還需要精心的研究設計，而這需要學術功力；二、單純使用數位人文方法，只能得出宏觀的趨勢，只有結合傳統的文本細讀功夫，才能揭示出宏觀趨勢的歷史意義。因此，利用數位人文的研究方法似乎未必是年輕學者的長處，有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經驗的資深研究人員倒更有可能做出重要的成果。

毛升 台北
2019.4.25

反思五四：「作者邏輯」應讓位於「歷史邏輯」

今年適逢五四百年，如何反思「五四」是華人學界頗為關注的問題。張千帆的〈契約構造的失敗——從辛亥到五四〉（《二十一世紀》2019年4月號）一文從清末民初契約政治的缺乏來檢討「五四」。首先，作者的觀點不算新鮮，「五四」是否要為後來的極權主義政治負責已是一個被討論過無數次的話題，作者認為五四運動後極權革命理論佔據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似是重複林毓生等人的觀點。

其次，要區分「作者邏輯」與「歷史邏輯」。前者已知最後

結局，難免有「後見之明」，但是「歷史邏輯」總是充滿着偶然性、歧義性、複雜性和張力（當然不排除某個時期有着相對的穩定性）。作者認為1919年後蘇俄的極權主義理論在中國佔據主流，似乎忽略了各種思潮的競爭：五四後期是馬列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各種思潮並存，蘇俄的極權主義只是當時多元思潮的一種，是否能佔據主流仍有不確定性。而且蘇俄極權主義在1924年前還未和高度嚴密的組織結合在一起，對其他思潮並不是絕對不容。例如在「科玄論戰」中陳獨秀和胡適固然有分歧，但還是有共同基礎的，都反對「玄學鬼」。《新青年》知識群體分裂後依然延續「五四」的精神。五四後期歷史的發展也不是直線上升，誠如楊念群所言：「『五四』本身的主題有一個轉換的過程，即經歷了一個從政治關懷向文化問題遷徙，最後又向社會問題移動的過程。這種變化不是簡單的線性遞進，而是交疊演化。」如果只是抱着熟悉化的心態，則容易忽視歷史的複雜性。

同樣地，作者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社會契約理論毫無建樹，恐怕是冤枉了新文化人。面對袁世凱、張勳等人復辟帝制，顛覆共和政體的情景，陳獨秀、高一涵等人引進的西方思潮中就明確提到契約論。陳獨秀翻譯的《現代文明史》中就提到洛克(John Locke)等人關於政府與人民之關係的「契約說」：「政府者，建設於組織

國民之公民等相立一種契約也。」高一涵在〈一九一七年預想之革命〉中也指出：「國家者何？乃自由人民以協意結為政治團體，藉分功通力，鼓舞群倫，使充其本然之能，收所欲蘄之果」，「國家建築於人民權利之上」為「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高一涵這種建立在「進化論」和「契約論」基礎上的國家觀，有力地批判了傳統的興衰榮辱繫於當權者一人身上、當權者可以行使獨裁的專制國家觀。

不僅如此，文中談論社會契約論所提倡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如思想信仰自由、言論新聞自由、平等、人身自由、財產權等，當年新文化運動主要成員都大力提倡，即便是被視為激進的五四運動之後，一些新文化人仍對此堅守，自由主義的思想啟蒙並沒有全被畫上句號。作者在文末展望中國未來時，沒有提到新文化運動所遺留下來的這筆遺產，有點可惜。今日中國大陸知識界所熱論的普世價值就是在新文化運動中被引進來的，我們要繼續完成這個未竟的啟蒙事業。

王琛 廣州
2019.4.15

非此即彼？

在邵棟的〈五四新文學場域與劉半農的思想轉向〉（《二十一世紀》2019年4月號）一文的描述中，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出現兩個對立陣營：一為逐漸轉向保守的劉半農、周作人等；一為逐漸走向激進的魯迅、潘漢年等左翼文人。作者基本贊同激進派，而對劉半

農等卻有點怒其不爭的味道，認為其有傳統士大夫權位意識的遺緒，還不是一個合格的現代知識份子。

那麼，左翼激進文人是否成為了現代知識份子呢？答案是否定的。左翼文人在追求現代自由和平等時走向了絕對，其絕對性與傳統士人之追求如出一轍。雖然左派的內容和口號看似現代，但其帶來的專制比傳統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絕對的自由和平等以強制性的群眾運動和階級形式展開。如果說在傳統社會中士人還可以擁有自己的狹小空間（至少有「天」可以對抗君王），還能表現出個人的氣節和傲骨，那麼在左派集體自由運動中，個體的自由和權利蕩然無存。

現代的一個最重要標誌恰恰是個體自由和權利。左派所接受的主義卻是集體或階級的自由和平等優先，且集體和階級中的自由與平等都是強制性的。極端反對專制和權威的左派反而鍛造出新的專制，它進入現代了麼？而劉半農等溫和保守派卻直覺認識到這種強求一致的絕對性和專制性，轉而拋棄了各種主義。這種行為反而更接近於個體自由選擇。

所以，是否為現代知識份子，不應只看其表面上的反傳統，還要看其在心性和思維上是否真正擺脫了傳統的影響。左派看似現代的口號和內容，其實隱藏着傳統的心性。正是因為傳統觀念中對絕對正義和道德的心理追求，才使左派知識份子容易接受這種道德性濃厚的極端自由和平等思想，從而製造了與傳統一樣的專制。

賈慶軍 寧波
2019.4.24